



国际刑警组织档案选



《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警官教育出版社

《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国际刑警组织档案选

DOSSIERS D' INTERPOL

[法]皮埃尔·贝勒马尔
雅克·安托尼

梅力 白国忠 梁大伟 译

主 编 庄继禹
责任编辑 林 石

(京)新登字 167 号

国际刑警组织档案

*

梅 力 白国志

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西便门胡同街李里14号

邮政编码 100031

*

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湘潭望城县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21开本 7印张 160千字

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ISBN7-81027-105-9/D·77 定价:3.30元

《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序

近年来,读者对《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的期望值很高。不少警界内外的读者为了改进业务、讲学、写作、拍摄电影、电视片或参加学术会议,希望这本杂志能系统地介绍或提供警察科学(Police Science)的某个方面的信息和资料。为此,我们曾感到困惑。

因为警察科学是一门交叉科学,它的交叉点和交叉面广及数十门学科。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法学、医学等进入和参与警察科学的发展已为大家所熟知。上述的这些学科与警察科学的核心部分进行交流所产生的大量信息,即使让杂志编辑部的全部人力穷毕生之精力去收集也是收集不完的。作为一本杂志只能做到尽可能多地捕捉“新鲜的”信息,但它远远担当不起警察科学资料库的任务。

然而,《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经过五年的惨淡经营,的确捕捉到不少新鲜有用的信息。这些先后分散得来的信息,假以时日,集中到一起,可以从中发现先前处于分散、单独状态的信息所不具

备的联系和意义。于是产生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现代世界警察》丛书。

这套丛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资料汇编,或是什么“集粹”“精选”之类。它将信息资料按专题整理和重新编排,使之处于一种结构关系之中,这样,原先分散,单独的信息可以负载更多的信息量,对读者,也就是信息接受者来说将产生更大的效益。当然,这样的编排不大可能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将同一个题目的许多方面都讲到,但它的用意在于从一些新的视角引起对专业读者或非专业读者都熟知的问题的再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并有助于我国警察科学的研究与警务工作的现代化。

编者

一九九一年一月
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

目 录

成 功

木匠的女儿
女巫
实习警察
千虑一失
第一劝业银行的电脑
尸骸的复原像
在加德满都的公路上
车祸
修道院走私案
四根毛衣针
双排扣西装

失败或悬案

藏身之处
穿丝绸衣服的魔鬼
遗忘症患者
不出所料
时装模特儿的身世
至今未了结的伪钞案
逃犯的同谋

特殊社会病态

沉着的莉莉·伍德
风流鬼
无妄之灾
“世界共和国”案
女邻居的猫

木匠的女儿

结冰的湖面上覆盖着无边的白雪，食物贮藏室高高地架在四根木柱上以防熊来偷食。房屋旁放着一堆棕色的木板，这是木匠罗伦森简朴而温暖的家。在罩上一层水蒸汽的窗户前有一排在冬日云雾朦胧的阳光下开始变绿的树。这天正是1949年12月15日，人们正在等待圣诞节的来临，但是在木匠家里既没有欢乐也没有恬静。木匠坐在起居室里。他那高高瘦瘦而又结实的身板犹如他库房里的木板。他的身体向前倾，双拳支在桌子上，竭力克制着自己。在他面前坐着他的女儿罗希，一个16岁漂亮的女孩，她固执地低着头。

“听着，我的孩子……听我说。你要明白我说的，这不是我的事，也不是你妈妈的事，而是你的事，是你一个人的事。相信我，此时我忘掉了一切，只想着你，想你的将来，想你的一生。”

罗希终于看了她父亲一眼，但是为了更好地反抗他，愈加表现出她的无动于衷，甚至她的蔑视。她没有看她父亲的眼睛，而是看他长在面孔中间的大大的鼻子，好象是一个贴上去的大木槌。他嘴里的一半牙齿已经掉了，他的手布满了老茧和青筋。无能为力的木匠转向他的老婆，她正坐在长沙发上流泪：

“你帮我说说她，瞧你哭什么？”

“罗希，我们都是为你好，我求你，听你父亲的话，”母亲哽咽地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们要干什么，”罗希不耐烦地回答道，“在医院里工作总不丢人吧！”

罗伦森先生强压着怒气：

“当然不丢人。可是我们把你送到商校不是让你去当女看护的。我们同意你

在假期里在医院里干活，但是假期早就结束了，你打算怎么通过明年的考试？”

木匠罗伦森就是这么说的。但是假如他会说服人，他会说别的东西。比如他会说他很伤心，他不再了解他的孩子了。他纳闷，他可爱的小姑娘，既聪明又肯用功的女儿（她的老师为她骄傲，还得到过学校奖给她的300元奖学金）怎么会变得如此固执。

那天罗希向他声明，她再也不愿意去商校了。这如同当头给他一棒。他吃惊地看着女儿……他一直认为孩子信任他，认为她会让她父亲去决定一切，认为她懂得父亲全是为了她而操持刨和锯子的。而现在她突然地摇着固执的脑袋说：不！

因此木匠认为这一变化是由一个坏男孩引起的。必须让罗希放弃医院上班的想法，回到家里来。但是这天上午看到罗希从停在扫雪车刚清出的路面上的长途汽车上下来时，他迎了上去，举起她的小纸箱子，发现箱子很轻。

“所有的东西全在这儿吗？”

“不是。”

现在该是解释的时候了。木匠是个耐心的男人，他试着用计策和哄骗来说服女儿。

“如果你想当一名护士，我们也不反对。但你先得通过考试。最好你能上护校，这样你就不用当一辈子护理人员了。你觉得如何？如果你上马勒莫护校？”

罗希只是厌倦地、荒唐地、轻蔑地笑了笑。

“爸爸，你不必费心了！我再也不想听到什么上学、考试了……我要回到城里去，回到医院去。如果有一天他们不

需要我当护理员了，我可以去当售货员。”

这次木匠师傅火了，使劲地跺着脚，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那么很好！你不再想听我的劝告和计划了？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吧，有个家伙缠上你啦，而你也不想放开他。”

罗希没直接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也许吧。”

这个回答使木匠失去了自我控制，因此他干出一件他从未干过的事：他打了罗希一个耳光，仅仅是一个耳光。罗希大叫起来：

“我恨你，父亲，我讨厌这些过时的劝告。是的，我恋爱了，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们不喜欢，我可以走人。”

她离开了房间，下了楼梯，消失在冬夜里，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女儿的出走是木匠可怕遭遇的开始。他先是自己行动起来寻找女儿。经过许多天焦急的等待，经过到处写信，打电话询问罗希的下落之后，他终于找到村上的警察登记罗希失踪。因为他，他的朋友、邻居，甚至地方警察局都认为，罗希毫无疑问是同一个男人出走的。

几个星期以后，大概是由于一封匿名信，一位国家警察局的警长来了。警长衣着笔挺，戴着一顶软帽子，双眼充满怀疑，询问了罗希的父亲。警长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述争吵的经过。当木匠说到他打了罗希一个耳光时，警长眼睛突然一亮，似乎他什么都明白了。

“那么您打了她？”警长问。

“是的，我跟您说了，打了一个耳光。”

“就是一个耳光？”

“当然了，就是一个耳光。而且并不很重，您知道她是个很受宠的孩子。”

“但是您发怒了？”

“我很生气，但还没到虐待我女儿的地步，我妻子可以证明。”

“您的妻子不能证明，因为她是您的妻子。您后来去追她了吗？”

“没有马上追出去。我这样两臂下垂地呆了几分钟，然后象疯了一样地追了出去。”

“但您没有追到她？”

“没有。天黑了，我在马路上跑，她大概走的另一个方向。”

衣着笔挺的警长眼睛里总是充满了怀疑。他戴上软帽子，走了。

随后几天，木匠吃惊地发现，警察不去找他的女儿可能去的地方，或者找那个带她出走的男人，却在他庭院的柴棚里上下乱翻；不去寻找人而让村里的渔民打涝湖底，他们在寻找尸首。警长推理很简单：这个壮实的木匠嫉妒、恼怒得发疯，在他追上他女儿以后就把她杀了，并隐藏了她的尸首。这一推理慢慢地终于说服了地方警察局，而且他们不停地向邻居们重复这一推理。

人们刚开始不相信，最后终于承认这不是不可能的。的确，罗伦森师傅很爱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的行为的确不规，木匠的确会恼怒。总之无风不起浪。这便是邻居们传统式推理所得出的结论。以致当他们读到报纸上白纸黑字，大标题写着由于缺乏证据，不能逮捕木匠，但警方确信他是凶手时，他们的怀疑变成了确信无疑。

从这天起，木匠的日子很不好过。邻居们远远地避开他，避免同他打招呼，再也没有人找他干活了。在这偏僻的地区，最疯狂的谣言开始在农民中间传播：有个女人亲眼看到过木匠装他女儿碎尸的盒子。没有人买他的鸡蛋，因为人们怀疑他的母鸡是用他女儿的骨粉喂养的。最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村长建议警长用他的公鸡去寻找尸首。

因为他的公鸡是一只奇特无比的公鸡，当它经过一具尸首旁边时，它会发出格利、格利的叫声！在隆冬季节，衣着笔挺，软帽下露出怀疑目光的警长同一群人出发了，领头的就是那只奇特的公鸡。他们在结冰的湖面上踩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格利，格利。”公鸡叫着。

“好啦，就在那！”

但队伍还没有来得及停下来，公鸡又开始叫格利、格利。

它叫了700次。衣着笔挺的警长恼羞成怒，当着全村人的面指责木匠：

“你们别担心，我的朋友们，是他在嘲弄我们，但他是凶手，我们会找到证据的。”

来年夏天的一天，木匠走进村庄里的一家店铺。过去在这个地方到处可见到这种店铺。店铺里既卖面包、芥末，也卖农具或拖拉机。木匠很吃惊地发现，他进来时村上的人没有避开他，反而都微笑地看着他。木匠仍旧径直向柜台前买东西。

“怎么？”老板叫道，“罗伦森师傅您还不知道新闻吗？”

“什么新闻？”

“您的女儿活着呢！在湖那边有人发现她装在瓶子里的信。”

对这些想求他原谅的人，木匠没有说一句话，而是飞快地跑出店铺。木匠没有意识到这一消息是不确实的，至少是令人奇怪的。他搂住他的妻子——唯一能相信他是无辜的人。

“忘掉一切吧，有人在湖那边发现了罗希装在瓶子里的信。”木匠说。

第二天，衣着笔挺的警长来敲门了，他总有一副怀疑的目光。他手里拿着一张在瓶子里发现的纸。上边有罗伦森的地址和以下的话：不要找我，你们永远找不到我。罗希。

木匠感到既轻松又担心：轻松的是他认为他所受的苦难从此结束；担心的是他不知道他的女儿成了什么人。他向警长提了一大堆问题。

“她肯定不在国内了，是不是？她可能结婚了吧？但如果结婚了，为什么不给我们捎个信来？大概一切全好？您认为如何？先生？”

警长没有回答，反而不耐烦地问他：“您认识您女儿的字吗？”

“是的。警长先生。这是我女儿罗希写的。”

“您能证明？”

“我向上帝起誓。”

在法庭面前，罗伦森师傅对他的证言起了誓。而且他认为他的恶梦结束了。然而他却大错而特错地估计了形势。信的笔迹经过首都字迹专家鉴别，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认为不是罗希写的字。报纸对此作了报导，邻居们又开始嚼舌头了。

“他自己把信放在瓶子里想骗警察，真想得出！”

没有人知道是谁把瓶子放在湖里的。有一天，这桩瑞典最大的疑案，终于真相大白了。

一个瑞典水手飘流四海，回到国内以后，听人谈起木匠的故事，并在报纸上看到罗希的照片，他认为他有义务使警察知道以下事实。下面是他向警察叙述的全文：

“我叫安瓦勒德马·安得森，是水手。我坚信我在温哥华的唐人街遇到过罗希·罗伦森。我们的船停在温哥华，在那里老板要支付我们的薪水。这大概是两年前的四月。我们是由好几个国籍的人组成的快乐的一伙。我们去了唐人街。在第一家酒吧我遇到了这个二十来岁漂亮的姑娘。她独自一人，表情忧郁。我邀她跳舞。她真是个仙女，她没说什么，她下巴上有一条小伤疤。她英语讲得不大好，但会说这个地方的土语。我们相约第二天晚上在酒吧相聚。我们在一块喝了酒。男人们都叫她罗兹。她跟我说她是加拿大人，名字叫罗兹一玛丽。我陪她到了她的住处。我坐在床上，她坐在我身边，她让我讲讲我的生活。我对她说，我不在海上飘荡时，就在澳大利亚剪羊毛。她问我什么叫剪羊毛？就是给羊剪毛，你应该懂这个词。如果你懂你的母语。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不是加拿大人，我是瑞典人。我困惑地看着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头发颜色这么深的

瑞典女人。后来我明白她把头发染了。我跟她说，我也是瑞典人，姑娘，去给咱们来一杯家乡咖啡。当她去厨房煮咖啡时，我看见桌子上有一封用芬兰语写的信。象其他瑞典人一样，我也懂一点芬兰语。信是以我心爱的罗希开头的，我还没来得及看下文，她就回来了。我开玩笑地说，你是叫罗希，还是叫罗兹一玛丽？她脸色变得苍白，大叫道，这是我的信，不关你的事！我无法解释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因为我才不在乎她到底叫什么呢！我是个水手，只想同一个女孩度过在温哥华的最后一夜。夜里，她讲了自己的身世：几年前一个朋友把她带到斯德哥尔摩。另外一个情人，一个芬兰人偷偷地把她带到大西洋彼岸。刚开始住在蒙特利尔，后来她来到温哥华的唐人街住下。我看到报纸上登出这个温哥华女孩的照片，“我确信是她。”

当然水手的话不关警长的事，但他不得不予以重视。更重要的是一个有名的律师知道案情新的情况，觉得事情并不是完全无望，便当了木匠的保护人。律师同驻温哥华的瑞典领事取得联系，并请他帮助寻找叫罗希·罗伦森，也可能叫罗兹一玛丽的姑娘。

几个星期过去了，领事回信说没有找到那姑娘。或者她自己拒绝出来承认自己的身份，要不她又更换了姓名，或者已离开了温哥华。因此国际刑警组织只好参预此案。

斯德哥尔摩国际刑警分部以关系到可怜的木匠罗伦森的生活为理由，请求巴黎总部发布寻人公告。

不幸的是，一天天地过去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所有分部都送来“不知该人”的答复。

罗希失踪马上快到6年了。衣着笔挺的警长一直积极寻找证据以便监禁木匠。在没有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瑞典司法部门已准备审判木匠了。他没有料到另外一名在国际刑警组织负责社会风化的刑警正在积极地做着相反的工作。

他坚信姑娘藏在温哥华，他说服了他在渥太华的朋友，一个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当总监的罗兰·马什，请他负责寻找罗希，并说服罗希为她父亲开脱罪名。

经过几天的寻找，罗兰·马什找到一位22岁的姑娘，长相与瑞典水手形容的完全一致：的确是棕头发，但眼睛很亮，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皮肤布满了小雀斑。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表情有些忧郁，口音很奇特，夹杂着一些粗俗的语言。她怀疑地打量着来访者。罗兰掏出自己的名片。

“小姐，我是加拿大警察。但我希望在几分钟里您忘记我的身份。另外，我不想对您有任何损害。我既没有对您提什么建议也无意在任何方面干涉您的生活。我只要求您听我说十分钟。十分钟后我走人，您将再也不会听到我的名字。我只是想让您看看这些报纸。”

在年轻姑娘的床上，罗兰·马什翻开了瑞典报纸：上边通栏报道了木匠杀女的案件。报上登有无辜的木匠参加指控他犯罪的听证会的照片，渔民排干湖水，警察仔细地在木匠花园和房屋里搜查的照片，吓坏了的母亲的照片，以及村里人嘲弄他们夫妻和自以为是的警长的照片。

尽管姑娘很自制，但见到报纸和照片，再也不能平静下来。罗兰·马什解释道：

“很可能您就是罗希·罗伦森，也可能您讨厌您的父亲，但是您恨他到这种程度吗？无论如何，要是您是罗希·罗伦森，无论您指责您父亲什么，您不会认为您父亲已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另外，您的国家法律允许您有消声匿迹的权利，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您必须符合法律手续。如果您是罗希·罗伦森，您就不符合法律手续，因为法庭正在寻找您当作主要证人。为了使您符合法律手续，只需要您回答一个字。当我问您是不是罗希·罗伦森时，如果您是，您只要回答我‘是’就可以了。您将符

合瑞典法律手续，也可能使您能对得起您的良心。我从此就走，您从此不会再听到我的名字了。您是罗希·罗伦森吗？”

“是的。”

“您愿意我把您的地址通知您的家人吗？”

“不。”

“您愿意我为您给家人捎个口信吗？”

“不。”

“您愿意保存这些报纸吗？”

“不。”

罗兰·马什收拾起床上的报纸，小心地叠好，放进挎包里。在他离开之前，只是简单地说道：

“我要是您，我会让头发重新变成金黄色……现在什么也不妨碍您了，金黄头发对您更般配。”

然后，罗兰行程4000公里从温哥华返回渥太华，回到他办公室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去电文：罗希·罗伦森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她化名为罗兹—玛丽，头发染成棕色。

女 巫

一个驼背的乘客扶在非特里哥号船舷上的手直发抖。这是一艘意大利造的破旧小游艇。它沿着早就废弃不用的防波堤驶进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港。旅客们准备下船。在岸上停着一辆豪华的雪佛兰轿车。一名嘴里嚼着口香糖的海关人员注意到：

“这家伙怎么有一个这么奇怪的驼背？”

“真的，是个不寻常的驼背。”另一个海关人员表示同意。

海关的豪华雪佛兰轿车关上了门。这个季节在佛罗里达仍旧很冷。风把钢丝绳刮得直碰几只抛锚小船的金属桅杆。港口的海水是绿色的。

驼背人的英语夹杂着口音，可以推断出是瑞士人的口音。他蓝眼睛，黄头发，壮实的身体却象秋风里的树叶一样瑟瑟发抖。

一个海关人员隔着衣服摸了摸他的驼背。驼背是由女人的胸衣和橡皮膏组合起来的，正如他们想象的那样：的确是一个奇特的驼背。

几分钟后，一直嚼着口香糖的海关官员走进船舱的包厢。里面有个微笑的年轻女人刚刚吃完早餐。海关官员差一点吞下去他的口香糖，我们正处在超短裙流行的时代，那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穿着一件白色女西服上衣，下边却露出晒得红红的、极为漂亮的臀部。

“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见鬼同一个驼背人在一起？”海关官员心里纳闷。

女人吃了一惊。海关要干什么？她拿出护照：乔治娜·路易丝·巴凯，法国国籍，26岁，西班牙阿利坎特的驯马师。她吃惊地看着海关官员搜查包厢。难

道她的同伴带海洛因了？

海关官员不一定愚蠢，船舱里有一张双人床。海关官员似乎很难相信年轻的女人从来没有发现她的同伴有一个假驼背。然而瑞士人却说：

“放她走，她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海关有自己的推理并坚持自己的推理。瑞士人走下吊桥，年轻女人跟在后边。女人不寻常的身份是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一秘密已在国际刑警组织档案里等待了十年。

在迈阿密，一座玻璃钢建成的大厦里，26岁的乔治娜·路易丝·巴凯已经等了十几个小时了，她的白色西服上衣已经开始发皱，可还是那么光彩照人。她面带微笑，一副我什么也不知道的神情。但她企图在黑黑墨镜后面的目光里掩盖某些奇怪的东西。

一切也许十分简单，但这个案子中有一种奇怪的气氛。结论：她的同伴瑞士人叫维利·查理·朗贝尔，37岁，瑞士洛桑人，三流流氓，因在日内瓦连续行窃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去年刚刚被释放出狱。现因他在假驼背中隐藏价值15亿旧法郎的海洛因而被捕。15亿旧法郎对这个丑陋的驼背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微笑漂亮的女人被指控为同案犯，尽管她的同伴不停地说她对此案毫无牵连。如果警察局能够证明她参与该案，那么她将被判处15年徒刑。这也许是一桩简单的走私案，但是出出进进办公室的警察都使劲地打量她，觉得她不是个简单人物。官方指定的律师脑门上都刻着深深忧虑的皱纹。

微笑女人与她同伴——一个微不足道的流氓的保证金为10万美元，相当于

50 万法郎。

不幸的是他们身无分文，也不愿意通知法国领事馆和瑞士领事馆。因此，他们没得到保释。他们整整一个星期被人带着穿梭于监狱和警察局之间。这段时间在迈阿密正是关掉空调而又没有放暖气的时候，年轻女人一直面带微笑冻得直发抖。

朗贝尔摘掉了他的驼背，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来，以父亲的温柔给年轻女人披上雨衣。

“你要杯咖啡吗？”

年轻女人用一种奇特的嗓音回答。从她嘴里吐出的字犹如一条小河的涓涓流水声。童孩的嗓音。很奇怪看到这么一个漂亮、戴着墨镜、面带微笑的女人竟有一个童孩的嗓音。

一个警察到自动售货台去买咖啡，在这座完全自动化的大楼里，电传机的短波无线电接受机上有来自全美国各个角落的声音。

警察回来了，递给女人一杯纸杯咖啡，然后向不知所措的律师说了几个字：

“她的护照是假的。要向国际刑警组织查询。”

三流流氓叹了口气，年轻女人软瘫了，她漂亮的孩子似的面容一下子衰老许多。玻璃钢大厦里的一个通讯员正在同华盛顿联邦调查局联系，该局有一个机构是与国际刑警组织始终保持联系的。

联邦调查局的机构所存档案里没有关于乔治娜·路易丝·巴凯的。但此时在华盛顿才是下午 3 时，机构完全有时间与在巴黎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联系，无线电台一直工作着。在巴黎，警署部负责人瓦郎坦装上了他一天的第一支烟斗，因为此时在巴黎才是上午 9 点。

正当瓦郎坦饶有兴趣地点燃他第一支烟斗时，莫尔斯电码正从华盛顿向国际刑警组织部门传来。

瓦郎坦盯着他办公室的门。这里的一切犹如一个准时行走的大钟：他将要

听到走廊的脚步声，然后一个女秘书将敲响他办公室的门。瞧，来了，敲门声。

女秘书放在办公桌上昨天夜里收到的最重要的情报。当中有一份以 XD 字母开头的电文，XD 意味着停发其他正在传递的电文而优先发送的电文。下边是正文：姓名，乔治娜·路易丝·巴凯，描述其体貌特征。假护照，参与重大毒品走私案。要求得到 C. A. R. H. O.。这是电文缩写，其意义是：寄来所有有关此人的材料，尤其是她的前科材料，她的真实身份和其犯罪活动。

与此同时，一千公里以外的迈阿密的玻璃大厦里，年轻女人的律师着手去了解当事人的身份。警察毫不客气地给一文不名的流氓戴上手铐。他肯定不是该案的主角。年轻女人拿着包香烟独自一个呆在警察局平静而阴郁的房里，天快黑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新人物。他走进房里，小心地关上身后的门。好象是个棕色头发的神探梅格雷似的，他拿过一把椅子，坐在年轻女人以对面，专注地观察着她，然后伸出手说：

“别害怕。”

他摘下女人的墨镜。年轻女人一直微笑着。男人长时间地看着她好象要从这张孩子般的脸上看出什么东西来。好象在这张重新修整过的脸后边有一张新的面孔。黑眼睛与如此金黄的头发不谐调……眼睛里射出的忧郁目光戳穿了满是稚气的脸。不久那永恒的微笑就会改样。难道她是一个女巫？

“真遗憾”，来人喃喃道，“真遗憾不能改变眼睛的颜色，是不是？”

“什么意思？”年轻女人问道。

棕红色头发的男人突然说道：

“我是私人侦探。我肯定您让美容师整过容。因此警方允许我与您来个私下交易。是这样，警察局确信您完全清楚这个可怜家伙的走私，确信在其他地方还藏着海洛因，并且认为您知道藏在什么地方。如果您肯说出海洛因所藏的地

方，而不是否认您犯罪，您只被判处5年徒刑，经过减刑后，您只需受3年的监禁。这就是我给您提供的服务。”

怎么能设想这么一个微笑、漂亮、不容侵犯、孩子般的女人，小鸟般的女人能接受被指控走私海洛因呢？然而经过片刻沉思，好象她在所陷进去的麻烦中把自己的利益分离出来，好象一个小姑娘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玩具中寻找自己的布娃娃……她细声细语犹如银铃般的声音问道：

“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笔交易？”

“您自己很清楚。当一个年轻女人让美容师整过容，用假护照参与一桩海洛因走私案时，这决不会是她第一次犯罪。很有可能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抽屉里有她的档案。大概在美国蹲3年牢总比在其他地方蹲10年好，而且……，您自己选择吧！”

此刻，在圣克劳德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里，从华盛顿拍来的电文正得到优先处理。

一位资料员坐在带轮子的椅子上穿梭于巨大的档案架前，那里有将近两百万份档案，她寻找着：

“乔治娜·路易丝·巴凯，嗯，乔治娜·路易丝·巴凯……”

半小时后，瓦郎坦同缉私小组长召开会议。

瓦郎坦问道：“怎么样？”

与会者无奈地摊开双手。

“在以字母为序和以语音为序的档案里没有发现有关乔治娜的材料。”

“那么在违法档案里呢？”

“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材料。”

“嗯，真怪。”

的确很怪，档案中存有以性质、时间、地点为序排列的50万国际性犯罪行为，以便能对比作案方式，犯罪分子在那次活动中专长、犯罪分子的体貌，甚至他们不断变换身份时也能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

另外瓦郎坦同美国同行一样也不相

信根据乔治娜·路易丝·巴凯逮捕时的情况和她奇怪的身份，她会是个初犯。肯定，在浩繁的档案里有有关她的材料。但是在哪里？她是谁？她曾干了些什么？

为使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秘书处当天向它在欧洲和美洲各个分部发出要求提供情报的电文并附有犯罪者体貌的描述。这是一场大游戏。国际刑警组织在自己的大海里寻找一根针。

在密阿迈，天已黑了。年轻女人被带到一所红砖砌成的监狱。她大哭大闹地进去，因为没有给她单间，因为人们夺去了她的最后遮避物：她的黑墨镜。但是她胃口极佳，把一天三餐所有的金属盘子擦得干干净净。当她不看电视时，就同同屋的两名囚犯绑架罪入狱的古巴女犯打扑克。她会讲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并乐于助人，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魅力。随着无线电广播的音乐，她同一名有名的男犯人跳舞。他是一个强盗式的工会主义者，领导着重型汽车司机团结工会。不久，女人的举动不再让人吃惊。因为她终于被确定了身份，象瓦郎坦那样，从此以后，人们只叫她“女巫”。

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要求，慕尼黑国际刑警组织分部终于发来了电传：她的护照是伪造的，她整过容，并染了头发，但是通过我们进行的指纹鉴定，毫无疑问她的真名是吕塞特·贝盖尔。

几天后，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大厅里，一个26岁的女人冻得发抖地坐在被告席上。她犹如一个失落灵魂的人。在狱中，她失去了晒红的肤色，被捕时穿着的西服女装已完全皱得不象样子了。

30名记者和摄影师挤在她身边，没有人注意到她以前保养极好的手指甲现已露出皮肉。他们的眼睛只盯住那张经过美容师整过容的脸，他们捕捉着“女巫”脸上的每一个表情。

当瓦郎坦得知她就是吕塞特·贝盖尔时，他找到一份发自瑞典要求逮捕她

的报告。仔细分析了这两桩案子，一个是乔治娜走私案，一个是吕塞特案，他从中发现了某些相似的东西。

几个星期以来，郎贝尔这个在美国第一个独身携带如此多数量的海洛因走私的三流流氓在他牢房里不停地重复着：

“我求你们，放了她，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句话引起瓦郎坦的极大兴趣。“她什么也不知道”，他对这句话感兴趣是因为七年前一个男人在日内瓦刑事法庭当着陪审团的面也这么说：

“我求你们，放了她，她什么也不知道。”

而他为了这女人却杀了人。

然而在那时，她叫吕塞特·贝盖尔，是罗伯特·贝盖尔之妻。这一对可恶的夫妻刚刚进入刑事法庭时，来自欧洲十几个国家的最好的记者都感到大吃一惊。

罗伯特·贝盖尔是个退休领事的儿子，他胖胖的，近视、结巴、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一个没有运气的大学生。吕塞特一直到这时为止还是一个不令任何人指责的女孩，她是个小企业家的女儿，毫无兴趣地参加过速记学习班。他俩因为在海边度假时犯的“过失”，所以一满成人年龄就结了婚。平庸无味的生活开始了。外交官的儿子是一家银行的职员，而吕塞特只是一个在郊区别墅里守着天长大的孩子打发时光的家庭妇女。

然后生活出现了转机，丈夫的父亲死了，给他们留下了2千万法郎的遗产。

结果罗伯特举行招待会，倒上满满一杯威士忌。人们嘲笑他的笨拙。他可以开昂贵的赛车了，可以小心地搀着穿着五光十色的吕塞特的手臂了。吕塞特渐渐成了一个统治者，现在有一个男人在她脚下，能为她拼命了。她受到人们的称赞、嫉妒、追求。几百万法郎很快挥霍一空，罗伯特又回到窘态，试图提醒妻子应该缩减开支，但是她用那种

眼光瞧着他以致他再也不敢说一个字。

从此，唯一的问题是怎么维持下去？他们找到了答案：

“如果我父亲失踪了……”

“如果你父亲也死了……”

事实上，谁也不知道是谁先说出来的。吕塞特几乎不怎么认识她父亲，因为他从没抚养过她。但是两个人都知道在他身后将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7月7日晚上，当罗伯特找到他妻子时，他只跟她说了两个字：“完了。”

此时，她正在跳舞，一个确凿的不在现场。

从此，到处可以看到他俩的身影：在梅日瓦，他们争夺了滑雪冠军，在夏纳开着白色普力第茨车、在优胜汽车大赛中夺魁，或时时出现在海滩边。

每天晚上，跳舞、夜总会。香槟酒流成河，人们说罗伯特是个无能的男人，从不拒绝吕塞特的任何要求，甚至她找情夫。在6年中，她先后有半打情夫，他知道此事，但从来不说什么。他爱她。这种荒唐的生活在1959年6月9日结束了。这一天，日内瓦发狂的一对离开了他们豪华的别墅到了牢房，这时罗伯特供认道：

“放了她，我求你们，她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是她切碎了她丈夫杀人时穿的血衣。因此，日内瓦法院处她8年徒刑。

吕塞特是个不知悔改的囚犯。当她厌烦时，她就发怒。她攥紧拳头，向女看守吐着舌头，做些让她们恼怒的事。她爱上了有名的首席律师，声称她不能在监狱里度过年华。

一个夏末的星期天，她在一个不知其名的女人帮助下成功地逃出监狱，乘一辆德国车离开瑞士。瑞士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发出要求各处提供情报并逮捕逃犯的电文，但电文一直放在总部的总秘书处里，一直到迈阿密法庭开庭。

“吕塞特·贝盖尔，”在星条旗下坐

着的联邦法官问道，“您被指控犯有走私海洛因罪，您承认您犯罪吗？”

“承认。”女人发抖地小声说道。

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瓦郎坦只是从报纸上得知诉讼的情况。他在猜想警察局能否得到满意的结果，“女巫”能否告知其他海洛因藏匿的地方。

瓦郎坦想象法庭诉讼大概在一种沉闷和严肃的气氛中进行。他自问吕塞特·贝盖尔怎么能到这一步？怎么会堕落到如此程度？对于那些在她光彩照人时认识她的人来说，她怎么会属于下九流社会？她怎么成了一个三流流氓的情妇，这简直是个谜。

她不是今天才与流氓无赖有联系的。为逃跑，她必须在下九流社会里找到同谋，为整容，她必然要进入一个能让胆小整容师保持沉默的社会。给她整容的人不会不知道她就是吕塞特·贝盖尔。6年来，多少男人对这个微笑的小女人着了迷。

在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日内瓦法庭

上心理学专家的声明。他们这样说：这个女人的智力年龄仅仅相当于13岁的孩子。尽管她的外表，她的聪明，她的冷静的计谋，但是她的智力仅仅是13岁孩子的智力。尽管她长着一张成年女子的面孔然而她却是有孩子似的新鲜感，孩子似的好奇，孩子似的固执，孩子似的多变和孩子似的残酷。这大概就是一个女巫。

几个星期后，瓦郎坦收到判决通知书。大概是因为美国法院曾同警察局有过交易，“女巫”仅被判处7年徒刑，经过减刑，只是监禁4年，就是说比引渡到瑞士少判了两年。所有这一切都严格地归入档案。人们仔细阅读这些档案，会发现“女巫”有一个小女孩。一致的意见是：她从来没有爱过这个女孩。大概她认为她再也不会见到她的女儿了，以致她拒绝提起她。

今天“女巫”大概被释放了。但是当一个人的指纹放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档案里时，他能得到完全的自由吗？

实 * 习 * 警 * 察

托尼本想到温泉般的水边去，结果在12月份的希腊沙滩上冻得发抖。此时是1970年。托尼20岁，穿着一身典型的嬉皮士服装：一件长长的印度毛巾衫和一条磨得几乎透明的牛仔裤。厚厚密密的胡子犹如皮毛围巾围在他那张瘦小的脸的四周，然而一直垂到胸前的头发却十分稀少，不能当他的风雪帽。他为了避风，爬过一个小沙丘，见到一个尸体。竟尽管他是个不信上帝的嬉皮，但出于本性，他还求助于上帝：“圣母玛利亚，保佑我！”……

的确托尼很后悔来到欧洲。虽然那儿有太阳，但它总是躲在厚厚的云层后边，与加利福尼亚南部沙滩的太阳相比不能同日而语。蔚蓝色的爱琴海海水翻滚着，沙子冷得象雪。昨天，他本该也差点这么做了：乘头班飞机飞到天空更蓝的地方去。

现在他要走就会受到牵连。如果他把刚才发现的尸体通知警察局，他肯定要被留下来接受询问。欧洲警察局可不大喜欢嬉皮士这类的人。自从他来到欧洲的三个星期中，就已经被搜查了17次，检查他是不是带了毒品。托尼面对着尸体犹豫着。他既不是一个无责任心的人，也不是一个蠢货。这肯定是一桩杀人案，而且如果不能及时抓住凶手，他就可能被指控为杀人犯。

但是公民意识是有限度的。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尽管并非出于他本意，他还是离开了尸体。走到大约离尸体50米的地方，他又转身回去。两行脚印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来回所走的路。人们知道他到沙滩上去睡觉，他得承认他见到了尸体。这场官司是跑不了了。因此，他

没有急急忙忙赶往机场，而是前往雅典警察局。

一个年轻的警官协助负责此案的侦探工作。尽管他留着小胡子，穿着深颜色的制服，打着齐齐正正的领带，做出严肃的样子但大家都觉得他还是个孩子。的确，尽管伊利亚·安布罗十分用功认真，但他总有一副嘲讽别人的表情，还有他那豆芽菜般的细身材只能使人产生极有限的信任。然而伊利亚却成了负责此案的侦探的助手。侦探用一种权威的口吻给他讲了一节刑事侦察课。

“当一个嬉皮士来报告发现一具尸体时，对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警察该怎么办？警察可以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询问，后者可以向嬉皮士所在国家分部发出询问。”

这样一份要求了解托尼情况的报告从雅典寄往华盛顿。借此机会，雅典警察局也要求知道有关死者的情况。尸体是这样的：黄头发，头发很短，几乎是剃光的，白皮肤上有星星点点的雀斑，很可能是旅游者。剩下的只有靠猜测：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他衣服上的商标也被割掉，好象凶手虽不毁尸却要灭迹。

个子矮小、面色苍白的侦探此刻不作声，他想叫法医拿出看法。法医几乎也用权威似的口吻阐述着自己的结论，意在给这位实习警察上司上课：

“尸体曾泡在海水中，因为我在他胃里发现了咸海水。但他并非溺水而死，因为他肺中并没有海水。他身上绑的铜线并不仅仅是为了捆他，同样也是杀人的工具。我认为他是被电死的。也许是电压不高，不足以使他马上毙命，所以通电的酷刑大概延续了一段时间。死者的

心脏是在遭电击后停止跳动的。然后凶手试图把他扔到海里，但没有成功。我发现在尸体身上不该有沙子的地方却有沙子。因此我认为凶手想埋掉尸体，可能在此时受到干扰，只好弃尸逃跑。”

“那么，伊利亚，您怎么考虑？”侦探问道。

年轻的警官只是作了一个表示怀疑的表情。既然头头们发表了见解，他哪敢有异议？然而他力图表现出不辜负人们对他的重视。

“头儿，我不知道。难道真是桩凶杀案吗？因为，如果……如果这些人要杀死这位先生，他们会用其他办法的。”

“好，如果这不是桩凶杀案，那又是什么呢？”

“嗯……我也不知道，头儿，有人……比如说有一家人家想通过武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结果这个人死了，那家想弃掉尸体以避免麻烦。”

老板思考着，抚摸着苍白的面颊，这个男孩说得很符合逻辑。

“但是，伊利亚接着说，干这个必须得有一间有电的空房子。如果死者是个旅游者，就应该挺容易找到他死前与他有来往的人。”

大侦探和法医惊讶地瞧着这个男孩子，的确他并不蠢。而那个大男孩直咽唾沫。

托尼在警察局等了12个小时了。他恨死了自己的长头发。然而当一个想打扮成嬉皮士的人，留着浓密的胡须和脏头发，就得学会耐心！当警察们从他发现尸体的沙滩现场回来之后，年轻的伊利亚被邀参加审讯托尼，并给托尼倒咖啡。令人吃惊的是，尸体上留下的手印十分清晰。

“然而有个细节要讲清楚，”年轻警官问道，“根据足迹，您距离尸体有两米开外，您怎么能象您所说的那样马上认出一具尸体来呢？”

“噢，”嬉皮士回答道，“首先是那身体的姿势，同一个熟睡的或失去知觉的

活人完全不同，他的身体弓成一个弧形，双臂小心地放在身体两侧。然后是几米长的电线捆在他身上。那人大概三十出头，身上到处是青块，尤其是在脸上。这样就不可能是一场事故，而肯定是谋杀。”

“那么，”脸色苍白的侦探在年轻的伊利亚结束他的审讯之后说道：

“我认为他是无辜的，他与此案无关。”

这时，华盛顿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寄来了对年轻嬉皮士有利的材料。托尼十分吃惊自己这么快得到释放，当天晚上他就乘飞机到了阿富汗……但是案情并没有大白。

国际刑警组织只是搞清了死者的身份，他叫朱利斯·卡里，桥牌冠军，洛杉矶唱片公司的经理，来此地已有一个月了。他乘的是一艘“赞地号”游艇，船是他妻子租的。已经四天没有他的消息了。他妻子报了警，并在雅典湾四处寻找他。

失踪者的妻子玛丽莎·卡里来到雅典停尸房，她今年27岁既不漂亮也不丑，但线条极好，很健壮，犹如运动员。她既害怕又吃惊，确认在沙滩上发现的尸体就是她丈夫。她不知道她丈夫有什么仇敌，他们在一起度着平静悠闲的假期。在雅典湾海达小站停船后，他就没有回来。

对海达警察局来说，很容易找到那天晚上与死者在陆地相处的三个人，先是两名“赞地号”的水手，然后是一名居住在海达的年轻女子埃莱娜·马克里斯。两名水手让他一个人留在女人身旁，他们先走了，从那以后，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玛丽莎·卡里本人知道丈夫有时玩玩女人。他对此并不向他妻子隐瞒，而她也不在乎。

第二天，大侦探听取伊利亚的汇报。大侦探对小伙子的才能很欣赏，就派他到海达调查埃莱娜·马克里斯。在侦探